

○ 哲学现代化丛书 (系列读物)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华 民族文化 心理素质简论

许苏民 著



中華
民族文化
心理素質開拓

◎ 朱國強 著



中华民族文化 心理素质简论

许苏民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卢文乔

封面设计：鞠洪深

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

许苏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20,000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2—00078·X/B·7

统一书号：2116·45 平装定价：2.05元

序

文化心理素质是文化心理学研究的问题。文化心理学又是文化学的分支学科。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卢伯认为，文化学以“文化系统”为研究对象，“文化系统”又包括有形结构和无形结构。从这种分法来看，文化心理素质属“文化系统”中的无形结构。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总是受着文化心理素质的制约乃至指导。但这种心理素质是隐形的，其作用甚至人们自己也意识不到。惟其意识不到，也就难免不自觉地受其所左右。特别是人们的心理素质，形成于潜移默化之中，积淀着民族文化的传统，因而心理素质方面的改变，也就特别难于实现。

在人身上有许多因素是自动地起作用的。比如，人并不需要去想怎样消化，消化系统就会自动地消化食物。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不必去认识这种自动起作用的因素。恰恰相反，自我意识是人的一个显著特点。生理学是对人体内自动进行的生理活动的自我意识，心理学也是对人身上自动进行的心理活动的自我意识。我们可以说，科学的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对本来无意识的达到意识，对本来不自觉的达到自觉。这种自觉和意识的发展程度，正是人的发展和成熟程度的一种标志。

在人的自我意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文化心理素质的自觉研究是较晚的。从文化学来说，它本身就是现代新兴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尽管在国外相当热门，在我国却刚刚提出。我们要建立一门文化学，还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不过，最近一段时期，人们对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研究，却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种越来越浓厚的理论兴趣，归根结底是现实要求的反映。

当前，我国人民正在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在其进程中，人们常常感到某种难于名状的无形障碍。这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存在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中的历史惰性力。有志于现代化事业的人们，虽然深切地感到克服这种历史惰性力是当务之急，然而，这项工作却不象引进一项新技术那样容易见效。先不说这种历史惰性力如何克服，甚至连这种历史惰性力是什么也不易认清。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为现代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历史遗产。对于这份历史遗产，如果不加分析地统统背起来，那就会成为沉重的包袱；而要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却又并非易事。更何况，分析仍不是目的，在分析的基础上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也就形成了“中西”“体用”的争论。对这场争论，我想用土壤上生长的果树来打个比方。果树要改良，一种意见是嫁接新品种；另一种意见是认为改造土壤更重要，否则，嫁接上去的新品种结出的果子也是要变味的。这里所说的“土壤”，其主要成分，就是民族文化心理素质。

这场讨论对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来说是很重要的，因此应引起更广泛的重视并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主编的“哲学现代化丛书”，以哲学自身的现代化和哲学服务于现代化为宗旨，因此约请许苏民同志写作了这本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专著。我认为，这本著作，无论从理论上建立“文化学”乃至“文化哲学”，或从实践上对于现代化事业，都是有其意义的。

许苏民同志要我为这本书写个“序”。本来我对所论问题并

未作过深入研究，但读了书稿，却为作者在书中表现出来的时代责任感所感动。特别是这种时代责任感又是和历史感交融在一起的，这也就显得更加深邃了。的确，一个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单有激情还是不够的，还要有尽可能广博的历史知识和透彻的分析能力。在这方面，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至于书中的具体内容，我就不细加论说了，还是请广大读者朋友们评判吧。在此仅将这样一点印象和感受写出来聊作为“序”。

张尚仁
一九八六年六月于广州

目 录

导言 探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及其现代化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一、关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定义及其内在机制	(3)
二、“两种民族文化”或愚昧与开化两种心理状态	(9)
三、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历史发展中的凝结沉淀与氤氲化生	(16)
四、人类心灵的共性和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个性的统一 ——文化交流、文化选择的内在依据和规律性	(23)
五、人类心灵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历史发展 的特殊规律的统一 ——设计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现代化形态的内在根据	(30)

第一章 中华民族传统的基本人生态度及其现代化

第一节 传统的“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精神的形成	(37)
第二节 “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48)
第三节 中华民族传统的基本人生态度与西欧、印度的比较	(53)
第四节 中华民族传统的基本人生态度的内在矛盾	(59)
第五节 中华民族基本人生态度中的近代思想因素	(66)
第六节 现代人生态度：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主体精神	(72)

第二章 中华民族传统的情感方式及其现代化

第一节 传统的“情理合一”的情感方式的形成	(82)
第二节 中华民族传统的情感方式与西欧、印度的比较	(89)
第三节 中华民族传统的情感方式的内在矛盾	(99)

第四节	中华民族情感方式中的近代因素	(106)
第五节	“情理合一”的情感方式在更高的基础上的复归	(113)

第三章 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及其现代化

第一节	传统的将部分与全体交融互摄的思维模式的形成	(125)
第二节	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与西欧、印度的比较	(133)
第三节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模式的内在矛盾	(140)
第四节	中华民族思维模式中的近代因素	(148)
第五节	现代思维模式：多样化的统一和以每个人全面发展为前提的一切人的全面发展	(150)

第四章 中华民族传统的致思途径及其现代化

第一节	传统的注重直觉的致思途径的形成	(170)
第二节	中华民族传统的致思途径与西欧、印度的比较	(179)
第三节	中华民族传统致思途径中的内在矛盾	(184)
第四节	中华民族的近代理性觉醒	(191)
第五节	以理性思维为主、直觉和形象思维为辅的现代致思途径	(197)

第五章 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及其现代化

第一节	特别注重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形成	(209)
第二节	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与西欧、印度的比较	(218)
第三节	特别注重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内在矛盾	(223)
第四节	中华民族价值观念中的近代因素	(239)
第五节	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价值观念	(247)

结束语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附：本书所参考的文献要目

后记

导言

探讨中华文化心理素质 及其现代化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可以把文化按其民族特点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共同的区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中的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是识别民族的基本标准。其中，地域只是民族生存条件的要素之一，语言只是民族文化之外在特征，共同的经济生活虽然是最终决定民族心理素质及其历史发展的因素，但也只是民族文化的感性的和物质的方面，而民族心理素质才是区别不同的文化类型的深刻的内在依据。全部文化学的问题，在上述意义上，可以归结为心理学的问题——依存于人类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人类精神现象学问题。它所要揭示的是人类心灵的共性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个性、人类心灵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地预见人类心灵和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发展前景。离开了这一人类精神现象学问题的研究，对于文化的高层次的哲学观照和深入细致的底蕴发掘，无异于“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

信难求”；于此相应，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而已经提上日程的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现代化形态的设计，也就只能是一个缺乏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依据的神光离合的心造幻影。因此，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乃是文化的基本内核，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乃是文化哲学的核心内容。

设计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现代化模式，还必须以科学地总结传统文化为前提。我们中国人治学，历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注六经”，另一种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陈旧性质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并且开始与之相揖别；六经注我，仍还有点积极意义，因为其意旨乃在于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所以至今仍为一些人所采用。但这种方法也有一个大弊病，就是缺乏历史感。特别是在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无论是论孔子，还是谈庄禅，都能从古人的形象中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使人感到声称为未来世界所必需的古代哲学原来竟是作者自己的哲学。诚然，人们对于社会的精神现象的认识，实在是很难做到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明白地进行表达的，因此，人们的认识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那样的主观色彩。但是，历史女神毕竟已经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女孩，在人类的实践发展中她已经达到了自我意识，能够洗净人们所赋予她的重重叠叠的铅华脂粉或污泥尘垢，而呈露出自己的天然丽质了。要做到按照传统文化及其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认识传统文化，对此作出高层次的哲学观照和深入细致的心理解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现代化模式，就必须将自己置身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化流行”中去神交古人、今人、未来人。

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的揭示与对于传统文化的科学总结，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的侧面。黑格尔说：“方法是对象自身中的灵魂。”本书所采用的方法也就寓于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哲学观照之中。

一、关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定义及其内在机制

所谓民族文化心理素质，是民族历史地形成的生存条件的内化和民族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在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中的凝结沉淀，是由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所塑造、陶冶而成的共同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观念诸方面所组成的有机的总体结构。

“文化”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指观念形态的文化，仅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广义的文化，则是指“人类的一切所作”，它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文化又可区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后者是前者的产物，前者又渗透着后者的因素，但两者都内化或凝结沉淀于人的文化心理素质之中。至于康德所提出的文化是人的内在心理的方面、文明是文化的外在形式或表现的观点，则是不确切的，因为按照这样的区分，就只有把进入文明时代以前百万年的人类社会生活排斥在文化之外了。扬弃康德的观点，可以把文化心理素质确定为文化的基本内核。

在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中，包括生存条件、心理氛围、社会意识形态三个层次。民族的生存条件包括民族与自然—社会—历史三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民族与自然界的关系，即是特定的民族在其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与自然作物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在此基础上而形成民族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中包括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与作为自身存在对象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两个层次。社会关系的民族特点制约着该民族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由此而形成民族与其存在对象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古代”^①社会形成的特殊历史途径、社

^① 所谓“古代”，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意义上，仅仅是指奴隶制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常识所谓古时候的意思。

会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稳定性程度、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民族特点等层次。以上三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的民族特点的造成，既体现了该民族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又作为直观该民族历史形象的图画内化为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表现为特定的民族心理氛围，进而升华为可以反转来影响民族心理的伦理学、艺术、宗教、哲学诸意识形态，并与上述三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一起，共同构成了该民族的文化背景：三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是民族的对象化活动为自身创造的主要的生存条件，因而是文化的基础部分；社会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基础部分的反映；而无论在文化的基础部分还是观念形态的部分，都凝结沉淀着民族的心理，因此，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作为生存条件和观念形态的文化之间的中介，本身就是民族文化背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了人，每一代人的心理素质都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中塑造出来的。所谓民族文化心理素质，正是强调了特定的文化背景与民族心理素质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说：“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织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①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亦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所织成的。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1828—1893）提出了构成民族特性的“原始地层”的概念，他说：

你们不妨把一些大的民族，从他们出现到现在，逐一考察；他们必有某些本能某些才具，非革命、衰落、文明所能影响。……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与精神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

这便是原始的花岗石，寿命与民族一样长久，那是一个底层，让以后的时代把以后的岩层铺上去。^①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他认为这个心理的最深层次个体是不知道的，它包含着连远祖在内的过去所有各个世代所累积起来的那些经验的影响；但真正的无意识的概念是产生于人类的史前史中，特别是表现于原始神话中；这一蕴藏在人类心灵最深处的潜在力量对精神发展起着最大的作用，是世代累积起来的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意向（archetype）。^②对西方学者的这些富有天才洞见的思想，可以而且能够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学说。提出构成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原初形态的“原始—古代”积淀层的概念，^③是我试图改造上述西方学者观点的尝试。民族与自身的社会历史的关系是扬弃了民族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于自身的最深刻的一重对象性关系，而古代社会形成的历史途径则是这一对象性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基本特点得以形成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关节点。马克思说过，各式古代文明的小孩，在其出生时也有区别：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也有发育正常的儿童。“亚细亚的古代”比“古典的古代”的形成早走了若干世纪，乃是马克思所说的早熟的儿童，而“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④此外，“古典的古代”的形成遵循的是抛弃旧形式、改造旧内容的革命途径，是文化和人生价值的重建；“亚细亚的古代”的形成遵循的是旧瓶

① [法]伊波特里·丹纳《艺术哲学》第353—354页。

② [美]杜·舒尔茨著《现代心理学史》第359—360页。

③拙作《论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

旧酒掺新酒的维新途径，是原始文化和人生价值模式的因袭的渐变。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原始—古代”积淀层。原始的文化心理素质经过古代社会形成的不同历史途径在各自的价值座标上的抉择取舍、并经过由野变文的改造而积淀下来，从而适应了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形态。古代社会形成的历史途径导致了前资本主义诸形态各民族社会基本结构的特点的一贯性（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的血缘宗法制度、西欧社会中的不同程度的个人本位），使这一积淀层的相对稳定性显得尤为突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是民族与自然—社会—历史三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而一定会触动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原始—古代”积淀层，尽管触动的程度在东方民族这里要比素有商品经济传统的西欧民族那里大得多，但依然是一种扬弃，某些最基本的特点仍将作为“集体无意识”而保留下来。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断言：民族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一样的特质”。①用现代心理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如同“一个人的每一种显著的态度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存在于儿童期的起源”②一样，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某些最基本的特点也可以追溯到“文明的小孩”诞生的时候。在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原始—古代”积淀层之上，同时又与这一积淀层紧密联系，交织着各个历史时代的心理积淀层。每个时代的民族心理既有为它的深层结构所规定的相对稳定的特质，又有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之原初形态的“原始—古代”积淀层，处在由历史（时间）的纵座标和社会（空间）的横座标所组成的座标系中，在历史地发展着的社会的物质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极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第401页。

② A·Adler :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纽约1929年版，英译本前言。

其纷繁复杂的交互作用下，经过不断的凝聚、积淀、氤氲、演化，方才成为今天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的主体结构都不是由单一的文化成分所构成，而是由至少两种文化成分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成分所组成的多元结构。多元间的差异首先是来自同一民族不同区域的人们与自然作物质交换的方式的差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异、某些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的差异等。中国古代有岐周文化、齐鲁文化、幽燕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的分野，赋予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以地方特色。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南北文化的分别：英雄豪侠慷慨悲歌的传统风气与北国的崇山峻岭、广阔原野相映照，有“俊鹤盘云、横绝朔漠之概”；尚文轻武的柔弱气质与江南的和风丽日、风花雪月相衬托，有“月明画舫、缓歌漫舞之规”。百年来又因受近代文化浸染程度不同而有“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之辨。中国是如此，西欧和印度也是如此。西欧文化作为一大文化系统，有南欧文化和北欧文化的差异，有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差异，有大陆文化与海岛文化的差异等。印度则有雅利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差异等。同一民族文化系统而不同区域的人们在文化心理素质上的差异也就体现在上述多元间的差异之中。其次，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个体命运的升降浮沉，亦需要适应不同时势和境遇的不同文化成分来保持心理的平衡。多元间的交汇贯通，使不同的地域文化中的不同的心理趋向形成了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中国有儒道互补，西欧有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互补，印度有苦行僧的精神与林伽崇拜的精神的互补。再次，由于社会中的人的心理需要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因此每一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中的互补结构也决不止是一对，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中的不同的互补结构。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中古形态中，就人生态度而言，作为中世纪“完人”典型的阿Q既有包括功名利禄在内的

儒家思想，又很有些道家的“真人”“至人”“神人”的风采。就对于宗教的态度而言，亦有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与民间的多神主义崇拜的互补。就阶级统治的心理而言，有儒家和法家的互补——外儒内法或儒表法里；有“皇权至上论”和“暴君放伐论”的互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腐败了的封建政权让位于由社会下层的贩夫戍卒、屠儿刽子、引车卖浆者之流组成的新的封建政权。在西欧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中，除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互补外，还有超越性的“一”与个体精神的“多”的互补，经验论的精神而唯理论的精神的互补。在印度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中，除了苦行僧的精神与林伽崇拜的精神的互补外，还有世俗生活中的“多”与幻想中的“一”的互补，有“因明”的严谨与直觉的玄虚的互补等。

每一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既是多元的互补结构，同时又有一寓于这多元的互补结构中的根本精神。这一根本精神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必须由民族与自然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所直接派生，因为在这一最基本的生存活动所派生的基本人生态度中，蕴涵了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一切特质的萌芽；第二，关于这一基本人生态度的观念必须是为活动于该民族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中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第三，这一观念作为该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逻辑起点，可以从中合乎逻辑地推演出相应的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观念，这种逻辑的必然是合乎人与自然—社会—历史三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的历史的必然的；第四，对这一根本精神所作的解释应该力求通过“神交古人”使之合乎历史的实际，决不能以“六经注我”的态度把诸如“人的主体性”之类的现代桂冠廉价地给予靠天吃饭、寄希望于清官和好皇帝的中世纪农民，更不能给予关心权贵者的利益胜过热爱真理的道学家。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根本精神，以往的学者们作过许多探讨，梁漱溟说是一种不向前、不向后的调和持中的精神，冯